

阿来：我等这本书等了十年

本报记者 童方

今年出版的阿来新作《云中记》，讲述了千年古村云中村，在八级地震中地裂天崩，又在次生灾害山体滑坡中消失的故事。

小说主人公是云中村的祭司阿巴。地震后，他没有和村民们一起易地搬迁，而是遵从职业的呼唤，回到灾后满目疮痍的云中村，焚香祷告，抚慰灵魂，最终与村子一起，在山体滑坡中重归大地怀抱。作家用诗性的笔触，史诗般的叙述方式，为山林、草木、河流及寄居其上的所有生灵画像。他通过阿巴的眼睛，呈现了这座村庄的历史和现状，描绘了村民的生活和命运。

这是一部酝酿了十年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记录灾难、书写崇高的乐章，它用庄严和悲悯，唤起崇高和希望。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地震发生。第二天，作家阿来启程赶赴灾区，前后盘桓数月，又酝酿超过十年。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阿来才动笔，2018年国庆假期完稿，2019年4月终于出版。他说，“这是我最爱的一部小说，我等这本书等了十年。”

十年酝酿

草地：您是怎样开始创作这本小说的？
阿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动笔写这部小说。那个时候我人在成都，本来在写另外一本书。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全城的警报一拉响，我坐在桌子前，突然一下子泪如雨下。地震发生后，我见过那么多死亡，也见过那么多感人的事迹，都没有流过泪。但是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流了泪。然后就关了原来那个没写完的小说，开始写《云中记》。

草地：听说您震后去了好几次灾区？
阿来：我首先是经历了地震，自己内心就不得安宁。从国家来讲，受灾的人是我们的同胞，从人类的意义来讲，他们是我们的同类。当他们经历这样灾难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同在，哪怕不能分担什么。这些都是发乎本心的，如果不是写这本书，这么多年我也从来没讲过这些。我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募捐，交了很多朋友，希望建一个学校，做规划做设计，虽然后来没有成功。真正做了这个事情，会很惭愧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觉得这个经验非常宝贵。做和不做，到底是不一样的。

草地：震后十年怎样酝酿这部小说？
阿来：就是积累，始终有一个中心，都往这个中心归拢。而且地震以后我也时常返回这些灾后重建的地方，干部我也见过，群众我也见过。震后几天我见过阿坝的一位副州长，一见面他就哭了。我赶紧问他，是不是你家里有人遭遇不幸？他说不是。他说：“这么多天，灾难一旦发生我就发现，我在这儿是层级最高的干部，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来。”我在《云中记》里写的乡长，也是这样。

书中的故事都有真实的依据，汶川地震一旦发生，通信全断了，跟外界联系不上，当天晚上所有能组织起来的干部，摸着黑就下去了，这一路上生生死死谁知道？那个时候干部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谁。这个副州长当时马上自任指挥长，就是承担责任。他家就在茂县（同样是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他说：“我把这么大责任，我怎么敢问家里？要是家里真有事，怎么办？”他的方式就是不问。我说，那你哭什么？他说：“老弟，什么都没了呀。你我是同龄人，你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从普通干部开始，三十多年，从基层干到现在，建设乡村，建设工业，改变基础设施。一条公路，我们不知改造了多少次才改造成现在这样子；一些电站、工厂，我们花了多少工夫才建设起来，形成这样的规模；农村进行了多少改造，才变成这个样子。几分钟时间，没啦！”

这是他最本质的感悟。“就算重新来过，我已经再没有一个三十年了。这个地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三十多年白干了！把我一生的奋斗都取消了！”一个干部的奋斗就是聚集在这些成果里，虽然没有一个是他单独干成的。他说：“不光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啊！你将来还有几本书，我有什么？过去从这里经过，我常告诉别人，这个电站是我组织建的，这个工厂是我下过工夫的，改制过后，慢慢便发生机。现在你看，就一堆烂砖头。”

草地：为什么说等这本书等了十年？
阿来：每一部小说一定要找到一种恰当的表达方法、语言方式。小说只靠内容是不可能成功的，问题是怎么来处理，怎么剪裁得当，什么东西说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从还在地震灾区时就开始准备，但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写。过于写实，好像会被事实湮没。离开写实，写那些极致的悲痛、绝望，或者写自救与救人的过程中，那些崇高的东西，但稍不谨慎就可能写偏，把真的写成假的，反而让人觉得崇高是虚伪的。这不光是我的经验，文学书写中有大量的这种失败的经验。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成立的关于灾难的书写。中国经历了这么多伟大的战争，但是还没有像西方那样伟大的战争文学。我们还是局限于基本的事实、行为，没有更深的理解，还在就事论事。由事情本身，强制性地寻找意义、附加意义。因为我们不太相信呈现事情本身。不把意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就怕人家不明白，也怕自己不深刻。所以我想了很久，很多年没有动笔，其实就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动笔那一天，我觉得我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还是要基于人的普通反应，基于人最基础的情感。

小说的原型

草地：《云中记》的故事，云中村里的人物有原型吗？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地震发生。第二天，作家阿来启程赶赴灾区，前后盘桓数月，又酝酿超过十年。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阿来才动笔，2018年国庆假期完稿，2019年4月终于出版。



▲阿来近照。

四川省作协供图

在写出大地的严酷的时候，更要写出大地之美。

用的方式叙述残酷和坚韧

草地：为什么要用美的语言来书写灾难？

阿来：文学是审美活动。写那些残酷、那些坚韧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用一种美的语言。今天的文学出现一个问题，当我们写下这些文字，写下这些记忆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不太确认、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美好、高尚的东西，自己先要相信。但是相信不是容易的事，我们更容易相信那些消极、黑暗的东西，好像这些东西更容易接近真相，更接近某种生存的本质。因而一旦有美的东西出现，我们可能本能地就对它有抗拒。尤其是在地震那种特别的灾变过程中，尤其是灾害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我确实看到了中国人身上焕发出来的特别美好、特别高尚的东西。

相信就会看见，不相信则会视而不见。看见了，感受到了，前行时会更乐观一些，光明一些，生命中的欢愉也会更多。

草地：您在题记里说“向莫扎特致敬”，为什么这样说？

阿来：地震发生后的第四个还是第五个晚上，我在震中映秀镇，大概晚上九点钟，救援者的身心都透支了，突然救援工作就暂时停下来了。探照灯一关，有人在帐篷，有人在墓地，我回到车上，睡不着。

一切都安静了，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作家的意识出现了。我们中国人，好像不会对死亡。一个人刚死，尤其是跟我们相关的人，我们悲痛欲绝，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悲痛一点一点减轻，直至我们差不多遗忘，这痛苦就消失了。我们对待死亡没有一种更美好的方式，不管是送他们入土，包括安葬的方式，墓地的样式，祭奠的形式，都好像不够美，不够纯粹。

我是个音乐爱好者，那天晚上，我特别想要有美一点的声音。那些叽叽歪歪的流行歌曲是不合适的，唱昂扬的爱国歌曲也不合适。我车里一大包CD都是这样的音乐。我一打开就把莫扎特特的《安魂曲》翻出来了。莫扎特写《安魂曲》时，他知道自己快死了，面对死亡之期，却那么温暖，那么美。他没写完就去世了，去世前把自己的构想告诉了学生，学生按照他的思路和方法，完成了这个作品。那晚我就想放《安魂曲》，但恐怕遇难者家属不同意。可确实忍不住，因为我睡不着，累了多少天。周围那么安静，周围就是死亡，而且不是一两个人，是几千人。

我终于忍不住放了，一开始声音很小，后来声音一点点放大。我觉得其实我们面对死亡，也可以采用一种美好的方式。这种美好其实更有尊严，或者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更体面。为什么？既然死亡已经发生，呼天抢地、悲痛欲绝有什么用？不如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些死亡不过是发生在我们面前，最后生命还要面临这个结

果。如果在我“伸腿儿”的那一天，我周围也是一片哭声，我不愿意。

所以那天晚上放《安魂曲》，我想有一天我要写灾难、写死亡的时候，要用美的方式，而不是悲苦不堪。中国人形容绝境，上天天无路，入地地无门，不是这种。所以《云中记》里一直探讨死亡，主人公阿巴一直愿意相信灵魂的存在。虽然按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不能证明的就暂且认为不存在，但是我想我要创造一个人物，即便在有与没有之间，也愿意相信。所以阿巴总是问自己，活人政府在照顾，死人呢，万一有鬼呢，万一有灵魂呢，谁来照顾？他也不确信有，所以他回到云中村，千方百计天天去找，而且找不到也让他很沮丧，因为找不到就意味着剥夺他的贡献的意义。最后他还是决定要相信，当这个村庄要消失，这些鬼魂也要跟着消失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牺牲。

草地：您觉得阿巴是选择了一种美的方式牺牲？

阿来：是的，他选择了一种美的方式，至善至美，去相信。政府培训他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时候，他还是个半吊子。他相信也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灵魂，他心里宁愿相信，就像一个信仰。这个时候，人的高尚的一面是，我愿意为我自己相信的东西付出。今天我们讲的职业的崇高感就从这来。一个写作的人就是奉上至善至美的文章，一个工匠有他的职业要求，一个政治家有他的职业操守。那么像他这样一个半吊子宗教职业者，他选择相信是他的职业需要。

草地：您认为阿巴是怎样产生这种觉悟的？

阿来：就是灾难，以及死亡。就是突然发现：生命很重要吗？片刻之间就可以抹去这么多生命。物质层面来说，云中村这样的村庄，经历了上千年才构成这样的规模，大地之手也可以轻而易举在瞬息之间一下毁灭。而大地毁不掉的是情感和精神。人的这些东西只有在极端的环境中，才可能被相信被唤醒。所以我们经常说，巨大的灾难，别人的死难和牺牲，有时是对活着的人的精神洗礼。如果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认知灾难加诸我们的东西，那我们从灾难中学不到任何东西。而且自己在见过那么多死亡之后，深感生命、财产都算不了什么。在灾难现场，你得承认不是一个人的灾难，甚至不仅是一代人的灾难。我写的云中村，一千多年的历史，毁灭不过转瞬之间。财产算什么，生命算什么？但最后能留下给自己一点安慰、一点温暖、一点信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精神、相信，不然人是活不下去的。

“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

草地：创作这本小说难度大吗？这部小说您觉得有遗憾的地方吗？

阿来：没有遗憾，这本书应该还是很成功，因为我自己等这本书也等了足足十年。如果说一般难度，哪用得着十年啊。

草地：《云中记》在您所有作品中处于什么位置？

阿来：《云中记》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长篇小说这是第四本，第一本是《尘埃落定》，第二本是《机村史诗》，我都觉得能够结结实实代表我不同阶段写作的最高水平。某种程度上，要是不嫌狂妄，也是当下中国小说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草地：翻开《云中记》的第一页，有您赠给读者的一句话：“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该如何理解？

阿来：这是小说中人物的话，也是我老家嘉绒藏语中的一句话。我们分别的时候一般说“慢走”“一路顺风”，非常庄重。古老的文化里，有时会有一些非常超出一般性的东西。其实我们那个山区，没有一条道路是笔直的，人生也一样。它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表达一个超现实的愿望。一些小人物，他自己面前的路都坎坷不平的时候，对别人发出这样的祝愿，而且把这种愿望时时刻刻送给别人。这种话不是随便说的，一定非常郑重其事。

草地：您希望读者从《云中记》里产生什么样的共鸣？

阿来：我不对读者有特别的期待。我觉得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能够自己完成作品的过程中得到满足，写《尘埃落定》时就是这样。但是我也相信，读者不可能面对一个好的作品无动于衷。虽然今天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读者要去追求一些更高层次的精神审美。我希望《云中记》至少在市场上，将来能够跟《尘埃落定》比肩。但各方面，《云中记》应该比《尘埃落定》更好一些。我今年60岁，写《尘埃落定》时30岁。天地恒长，有变有不变。

草地：您怎么看待自己作为四川省作协主席这个身份？

阿来：我想作家无非就是除了自己的私生活以外，跟工作相关就三个方面：一个是写作，一个是阅读，一个是深入生活。我倒没有想说私生活要给谁做表率，我不是一个道德信徒。但是我希望我在跟工作有关的方面，能够对大家有点示范的效果。我确实希望，我们总是互相影响互相交流，而且文化基因是在这种互相影响交流中传承和变化的。但是可能今天的消费社会提倡了一种另外的价值观，或者很多人做事基于功利心的考虑更多，我不能说他们一点精神指向都没有。但是当我必须来履行这个职责的时候，我又觉得还是要做好。

远人

逐字逐句读完最作平的长篇历史小说《青山夕阳》，时时感觉自己伴随主人公杨慎生活在五百多年前的时代。

今人知道杨慎，都是从《三国演义》那阁无人不知的序词《临江仙》开始的。能写出千古流传作品之人，其生平与生活都应该为人耳熟能详，偏偏杨慎的生平还真真不为读者熟知。我的感受是，最作平以杨慎为主人公，写下这部三十万言的长篇小说，既是填补一个空白，也是为自己多年的历史研究做出另一种交代。

杨慎生活在明朝，今天的历史研究者特别感兴趣这一朝代。无数人的毕生精力关注朱元璋布衣起家，问鼎天下；明成祖兴兵夺位；万历数十年不理朝政；崇祯被农民军逼迫自尽等历史事件。对明代的文人，很少人抱以关注和热情。毕竟，明代的文学成就集中在施耐庵、罗贯中等小说家身上，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在明朝表现平平，既无法超越垂范千秋的唐宋时期，甚至比不上随后勃兴的清代。以“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为主角，自然会令人觉得，最作平想要刻画的，或许是一个遭人忽略的才子命运。

但若真这样写，《青山夕阳》的深度恐怕达不到我们今天所体会到的程度。

一开始，最作平就没打算专心致志地刻画明朝的文人生活。全书开篇从杨慎遭受廷杖之辱起笔，惊心动魄地拉开了杨慎后半生的序幕，也揭示了朱明皇帝对待违谏大臣的冷酷无情。在最作平这里，这样的开篇并非单纯为吸引眼球，他的笔触细腻无遗地描绘着刑罚现场，也将杨慎与嘉靖的冲突推向顶点，让读者不得不一步到位地“面对”冲突。最作平当然懂得，小说需要冲突，有冲突才有发展，才有性格塑造。最作平将杨慎与嘉靖的冲突展现给读者时，也将那个时代的冲突和嘉托出。

嘉靖在位时，是明朝从巅峰逐渐衰落的时期。嘉靖既不好大喜功，也不开疆拓土，更不爱民如子，皇权就是此刻的皇权，天下就是此刻的天下，在祖先的荫庇底下享其成。所以嘉靖一朝，朝廷内外都看似风平浪静。但无论什么样的时代，总是不缺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冲突。杨



慎与嘉靖的冲突不仅是个人性格的冲突，还是皇权与一代士人的冲突，更是时代平庸与个人卓异的冲突，这就使小说的内涵丰富地展开。

最作平大胆采用了多视角的表现手法。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最强烈的冲突焦点集中在第一部。最作

平的创作手法更令人眼花缭乱，以七个人的言说来交代这一被时代掩盖的剧烈冲突，小说的叙述者上至嘉靖，下至占山为王的土匪，这是巨大的落差，也是反映时代各个层面最好的叙述方式。每位叙述者都从自身出发，将所有线索和亲历亲见全部交集在杨慎身上，让读者既能看到杨慎的各个侧面，又能看到各种人物对以杨慎为核心的士人们或倾慕或冷漠的态度。在读者这里，几乎是自己也未觉察地对嘉靖一朝的平庸底色有了真切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对主人公杨慎有了真切的感悟——个活生生的士人形象在读者眼前浮现，他遭受着不公的对待，经历过无尽的流放生涯，却始终无法摆脱身处的平庸时代。对心怀抱负的人们来说，忍受平庸比忍受火狱更为艰难。杨慎的一生虽不平淡，却无时无刻不在平庸的氛围中深陷——出场的每位叙述者，除了他们眼中的杨慎，谁不是那个时代塑造的平庸之辈？所以，杨慎的流放是个人的流放，不是一个时代的流放。因此，最作平以看似奇峰突起的廷杖为开篇，也不过是在平庸的时代中凸显杨慎个人的痛点。

传统士大夫，士可杀不可辱。不论最作平将廷杖描述得如何残酷，仍不惜以第二次廷杖的屈辱来展现杨慎内心的激烈冲突。无论时代如何，平庸从来不是士人们的人生取向。所以在我读来，最作平笔下的杨慎甘愿受辱也不愿让自己随波逐流，是一个士人对己命运的选择，也是数十年中国传统中一位真正士大夫的选择。也正因如此，和杨慎有所交集的所有人——除了嘉靖，都不由自主地尊敬他，追随他，发自肺腑地仰慕他。

整部小说中，最作平始终将细节的虚构依附在真实的历史中，我们才从杨慎身上，真正体会到一个士人的人格魅力和力量。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许多人的选择甚至历史成就，其实是时代中的被迫无奈。承平时代，杨慎的选择却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主动走进。正因如此，我们才从杨慎那里看到一个庸世的耀眼之处，它集中在杨慎的日常当中，也集中在杨慎的言行当中。作为读者，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当一个人驱使自己的人生逆流而上，他会到达自己所处时代的什么位置。

如此运笔，最作平的小说才跨越主人公的文学成就。杨慎的文学成就固然值得一写，但从他在庸世中提拔而出的人格来看，单纯的文学成就无疑比不上他为那个时代镀上的亮点，哪怕这亮点是以半世流放为代价，却让读者体会到，漫长历史中的精神价值怎样薪火相传。

人无法避开时代的笔误。杨慎的确属于他的时代，却又不断地超越时代，这就使他和时代的关系变得千丝万缕而耐人寻味。最作平以其出色的文笔和架构故事的能力，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士人的形象，也是一个孤独者的形象。不论杨慎身边聚集着多少人，他始终是孤独的，不论在朝之时，还是在云南的流放岁月。在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中，孤独也许就是杨慎对那个时代做出的最激烈抗争，令我们在掩卷之余，不得不感叹，不得不唏嘘，也不得不生出朦胧的向往。

孤独者杨慎